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葉元章 鍾夏 選注

朱彝尊選集



葉元章 鍾夏 選注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朱彝尊選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朱彝尊選集 / (清) 朱彝尊著; 葉元章, 鍾夏選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ISBN 978-7-5325-9030-8

I. ①朱… II. ①朱… ②葉… ③鍾…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45345 號

責任編輯: 祝伊湄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朱彝尊選集

[清] 朱彝尊 著

葉元章 鍾 夏 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6.875 插頁 5 字數 470,000

2018 年 11 月第 2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100

ISBN 978-7-5325-9030-8

I·3333 定價: 6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出版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向重視中國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出版《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讀》等基礎性普及讀物的同時，又出版了兼顧普及與研究的中級選本。該系列選本首批出版的是周汝昌先生選注的《楊萬里選集》和朱東潤先生選注的《陸游選集》。

一九七九年，時值百廢俱舉，書業重興，我社為滿足研究者及愛好者的迫切需要，修訂重印了上述兩書，並進而約請王汝弼、聶石樵、周振甫、陳新、杜維沫、王水照等先生選輯白居易、杜甫、李商隱、歐陽修、蘇軾等唐宋文學名家的作品，略依前書體例，加以注釋。該套選本規模在此期間得以壯大，叢書漸成氣候，初名“古典文學名家選集”。此後，王達津、郁賢皓、孫昌武等先生先後參與到選注工作中來，叢書陸續收入王維、孟浩然、李白、韓愈、柳宗元、杜牧、黃庭堅、辛棄疾等唐宋文學名家的選本近十種，且新增了清代如陳維崧、朱彝尊、查慎行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選集，品種因而更加豐富，並最終定名為“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本叢書的初創與興起得到學界和讀者的支持。叢書作品的選注者多是長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名家，功力扎實，勤勉嚴謹，編輯精當，注釋、箋評深淺適宜，選本既有對古典文學名家生平、作品

特色的總論，又或附有關名家生平簡譜或相關研究成果，所以推出伊始即深受讀者喜愛，很快成為一些研究者的重要參考用書，在海內外頗獲好評。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本叢書品種蔚然成林，在業界同類型選集作品中以其特色鮮明而著稱：既可供研究者案頭參閱，也可作為古典文學愛好者品評賞鑒的優秀版本。由於初版早已售罄，部分品種雖有重印，但印數有限，不成規模，應讀者呼籲，今特予改版，重新排印，并稍加修訂。此叢書將以全新的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前 言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浙西詞派的創始人。其詩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他學識淹博，出經入史，精於考覈，勤於著述。輯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卷，《明詩綜》一百卷，均流傳於世。又撰有《瀛洲道古錄》、《吉金貞石記》、《粉墨春秋》、《禾錄》、《鹺志》諸書。晚年手自刪定《曝書亭集》八十卷，收入一生主要作品，性質略近於全集，流行甚廣。中年時，曾自編《南車草》、《竹垞文類》及《騰笑集》行世。

朱彝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里(今王店)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攝本部尚書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東閣，後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為榮的。祖父朱大競，國祚長子，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擢工部主事，坐事獲譴，思宗即位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不

久，奔母喪回籍，卒於家。竹垞之父朱茂曙，未仕，學者稱“安度先生”。撰有《兩京求舊錄》。竹垞係其長子。

竹垞早慧，有神童之目。《國朝先正事略》及朱桂孫、稻孫所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稟，“書過眼不遺”。後者還說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於詩藝尤工”。幼時，塾師舉“王瓜”命作對，竹垞應聲曰：“后稷”。所叙或不無誇飾，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

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貧寒無以自給，生活極不安定外，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國朝先正事略》說他“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而據《行述》，則應為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竹垞十二歲時事。是歲，浙東西大饑，人相食，竹垞家亦至絕食。當時，芾園語竹垞：“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學古。”“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這，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表面上看來，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改學古文，是由于時局混亂。究其實，恐另有原因在。若按《國朝先正事略》的說法，竹垞當時是十七歲，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恰好是順治二年，清朝定鼎之第二年。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又據《行述》，芾園極其推崇黃淳耀文，曾以其稿授竹垞，囑研習之。一六四五年，也正是黃淳耀抗清失敗、不屈殉難的一年。這很值得玩索。何況，芾園之兄，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竹垞為其繼子），晚明時曾為復社領袖。這中間的蛛絲馬跡，自更不容忽視。

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為明朝重臣，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亦所必然。這就成為他日後參預抗

清活動的一個思想根源。據《行述》：竹垞“乙未始游山陰，過梅市，訪祁氏昆弟，留數月。”乙未是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竹垞二十七歲。祁氏昆仲，指曾任南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理孫兄弟。梅市是個小地方，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其過從之密，概可想見。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曝書亭集》，刪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游的一部分有關礙的作品，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別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內情。例如竹垞《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一詩中，有句：“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並寄托了竹垞深沉的故國之思。又如竹垞另一首《梅市逢魏壁》，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雖窮困潦倒，鬢髮盡白，仍不改初衷。詩中還盛贊“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最後竹垞勸慰魏生：雖則所謀未成，“百年強半成蹉跎”，但不可灰心喪氣，“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獨悲歌”？透過此詩，竹垞與祁氏兄弟、魏壁之間的親密關係，自不難概見。此外，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

一、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遺民詩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繫。據《行述》所載，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在那裏待了兩年，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交游甚密。屈、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進行武裝鬥爭，兵敗後，削髮爲僧，後又還俗，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以布衣終。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桂王敗亡後，隱居不出。竹垞留粵達二年，顯然是有活動的。《曝書亭集》有關這方面的吟咏，多係流連光景、詩酒酬贈之作。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不

過，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如《喜羅浮屈五過訪》、《寄屈五金陵》、《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聯句、《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寓山訪屈五》等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則兩人過從之密、交誼之篤、志趣之相投，灼然可見。竹垞比翁山於屈原，以為其所為“皆合乎三閭之老”（見《九歌草堂詩集序》）。又如竹垞《將歸留別粵中知己》一首，寫到“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可見留粵二年，並未悠游自在。至于“于役”的內容，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都未細說。全詩哀婉淒苦，所謂“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云云，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別恨了。

二、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據《顧亭林詩文集·出版說明》）。按《曝書亭集》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僅有一篇《與顧寧人書》，純係論文，不及其他。而《亭林詩集》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全詩二十四句，十二韻。是否即係竹垞《與顧寧人書》所說的“贈以長律二百言”，待考。不過，從亭林詩中“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等句看來，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也是毋庸置疑的。至於李因篤，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促其准許李因篤歸養老母，並為李父撰寫墓志銘（見《亭林文集》）。凡此，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另，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魏乃明末諸生，明亡後不食周粟，隱居翠微峰，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

三、竹垞為朱士稚撰《貞毅先生墓表》一文中，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父官雷州知府，祖曾為明大學士，與竹

垞家世極相似。竹垞早期詩作中，有《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以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後者寫得頗為沉痛，但不具體。而《墓表》則談到士稚“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又說到士稚出獄後，“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於梅市，後先凡六人”。還說到士稚死後，“二人渡江，經濟其喪，視斂含”。“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最後，說到死者之親屬“曾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又明年，“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儘管敘述時閃爍其詞，若細加尋繹，仍可知其大概。

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或稍後。其事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等言之甚詳。這裏所謂的朱士稚“散千金結客”，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後來至歸安（今浙江吳興），得好友二，其一即魏耕，又名魏璧。另一當是錢纘曾。加上竹垞、陳三島、祁班孫，“後先凡六人”。他們往來吳越，為國事奔走。所謂“以詩古文相砥礪”，不過是個幌子，遮人耳目罷了。這六人志同道合，密謀共圖大事，在共同鬥爭中結成深厚情誼。竹垞也坦率地承認，“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這，除了文字之交，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如今，“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只剩下竹垞一人，為了避禍，不得不奔走於道路，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一般墓表之類，屬於應酬文字，語多泛泛，而竹垞此文却大異於一般，寫得既沉痛，又真摯，可說是捶胸頓足，字字血淚。若非並肩戰鬥的患難至交，斷難至此。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再

參照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和其他有關資料，則於竹垞早年曾參預抗清活動一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遺憾的是，竹垞中年以後，竟一改初衷，應清王朝“博學鴻詞”之徵，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未幾罷歸。竹垞以明顯宦之後，磨劍十年，結客五陵，聲華藉甚，終不免於輕出，論者惜之。

二

竹垞的文學作品，詩占了較大比重。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受宋詩影響較深，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而學宋，作為一種風尚，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如錢謙益、黃宗羲、吳偉業、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稍後的首倡“神韻”說的王士禛，其中年為“避熟求新”，也“越三唐而事兩宋”。朱彝尊早年宗杜，認為杜詩：“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捨子美其誰師也？”可謂推崇備至。他步武七子，追蹤唐音，強調：“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均見《與高念祖論詩書》）并引西泠十子為同調。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堅持明七子、西泠十子的宗風，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博采宋人之長，標舉黃庭堅。

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當時，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他指責李夢陽曰：“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黃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貶抑宋元，也認為是絕對化了。他為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說：“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構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從而

指出：“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縵之體，海內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錢舍人詩序》）他與黃宗羲都主張學唐應致力於得其神理，反對模其形似，亦步亦趨。同時，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謂：“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歟？”（《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他既非盲目地宗唐，亦非無條件地學宋。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他在《王先生言遠詩序》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使出於一”，“以唐人之志爲志”，結果，“辭非己出”，而流爲“剽賊”。他自稱“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這種變，是“知正而言變”（《丁武選詩集序》），是像某些宋人作者那樣，“學唐人而變之”，並不是要“軼出唐人之上”，更不是“捨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均見《王學士西征草序》）。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如果不曾目睹全唐人之詩而言宋，那是“不足師”的。變，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這樣，才能“變而成方”，“臻古人之域”。歸根到底，宗唐是正，言宋是變，本末不可倒置。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順應着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化，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竹垞詩“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論清詩，則以竹垞、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秋谷於清人，持論甚苛，少所首肯，故這一評價，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朱、王有共同處，他們都有鑒於“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詞”的弊病，有志於力矯清

初“談詩競尚宋元”的風氣。故早年都標榜盛唐，又都是古體崇王、孟，律以杜甫爲法，二人亦各有所得。朱功力不亞於王，惟爲詞名所掩，加上其他因素，以致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家，創作上富有成果，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成爲一代正宗。

當明亡時，竹垞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清兵入浙，他親歷過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二十一歲客山陰，與祁彪佳之子理孫、班孫相過從，與抗清志士共同參預了鄭成功、張煌言進軍長江的密謀。事敗後，他避禍溫州。直至五十歲那年，出應清廷博學鴻詞試中式，以布衣被授予翰林院檢討，當了一名小小的七品官。這是他一生的轉折。經過長時期的深自韜晦和奔走逐食，青年時期的銳氣早已消磨殆盡，如今走上了仕途，地位變了，就更加謹飭穩練了。詩的風格自然也與早、中期有所不同。他晚年手定的《曝書亭詩集》，其中大量保存的是應酬贈答、模山範水、花草蟲魚、咏懷古跡以及嘲風弄月、豔情、閑適之作，已很難找見早年鬥爭生活的印跡。而與祁氏兄弟、魏璧等的一段往事，尤極力隱諱，其有關詩篇，多被刪削，所存者僅詩酒流連、飲宴唱酬之什。能反映那個時代面貌的，有他十八歲時所作的《曉入郡城》和十九歲時所作的《舟經震澤》二首。前者透過“壞籬”、“古道”、“孤城”、“兵氣”、“昏烟”等富有特徵的景物描寫，着重渲染了郡城嘉興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和作者的悲苦惆悵（其《悲歌》所云：“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瑩瑩曠野。”所表達的是同樣心情）。後者則憑弔了太湖抗清義軍首領吳易，通過象徵和比喻手法，寄托了作者對這位“節士”的景仰和懷念，頗有現實意義。集中《捉人行》、《馬草行》正面揭露清兵和官府擾害平民的罪惡行徑，滿紙辛酸，深得杜詩、白居易樂府的遺意。《玉帶生歌》取材于文天祥故物，寫來慷慨悲歌，音節蒼涼。通過咏硯，作者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氣節和

謝翱的情操。沈德潛曾評此詩云：“小小一硯，傳出信國之忠，皋羽之義。”又曰：“硯與信國雙收，是何神勇！”可見評價之高。《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規模宏大，格調清新，不失為《竹枝》遺響，其描繪浙西水鄉風土人情，頗具特色，一時和者甚衆。竹垞早年游甌，所作甚夥，不乏可觀。其中，如《永嘉除夕述懷》、《東甌王廟》，皆五言長律，既饒性情，又極見功力。北游雁門諸作，風格沉雄蒼勁，寄托遙深，均屬上乘之作。如《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早遣金縢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全詩痛于謙之死，譏英宗庸劣，斥諸將奪門之誤，結句尤饒餘味，愛憎十分鮮明。

又如《宣府鎮》、《雁門關》等亦屬此類，借咏懷古跡，寓故國之思，宛轉低回，一唱三嘆。至如其他弔古之篇，如長律《謁大禹陵》、《岳忠武王墓》、《于忠肅公祠》、《謁劉文成公祠》以及五律《文丞相祠》、《濰水弔韓淮陰》等，議論正大，感慨深沉，格律精嚴，堪稱力作。餘如酬應諸篇，亦時有佳什。如《逢姜給事採》、《送林佳璣還莆田》、《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等，亦明心見性，絕少矯飾。除此而外，在他後期作品中，感情真摯，手法新穎，較有個性的作品就一般不多了。但既遭貶謫，政治上受到打擊，中心鬱結，遂不無怨憤之詞，間於時政有所譏刺，亦自難免，不過是手法更加含蓄隱蔽罷了。

總而言之，竹垞詩，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前期有不少傷時感事之作，其中若干篇章且能直接觸及社會政治，反映民生疾苦；中期

浪游，所作多弔古傷今，其胸中硯礪，隱約於字裏行間；後期則以寫生活瑣事及閑情逸致爲主，較爲可觀者無多。尤其是侍宴、侍食、歌功頌德以及某些《閨情》、《閑情》之類的作品，格調卑下，表現了封建文人熱衷利祿及其輕浮儂薄的通病，乃是集中的糟粕，不可不加以區別。

竹垞晚年兼取宋詩，但其重點仍在宗唐。已如上述。他本是學者，精於經學，與黃宗羲交游，論詩受其影響，曾表示：“天下豈有捨學言詩之理？”（《棟亭詩序》）這裏的學，指的就是經學，他是認爲不通經便無以爲詩的。這種論調，儘管不無可取之處，却也體現了他的封建的正統觀點，極易產生流弊。竹垞讀書既多，作詩免不了掉書袋，那首著名的《風懷二百韻》，便是用大量典故堆垛起來的。又如《齋中讀書》十二首，很有點“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味道，雖未必是有意蹈襲宋詩，總不無影響。趙執信曾譏刺朱詩“貪多”，沈德潛的《說詩晬語》中也提到：“放翁七言律，隊伍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意思是說，詩之“貪多”，非自竹垞始，竹垞的“貪多”，原是有師承的。但此事歷來看法不一。錢仲聯說：“趙秋谷《談龍錄》論詩，頗議竹垞‘貪多’，夷考其實，殊不盡然。……如《閑情》三十首，僅存八首，具見剪裁。秋谷所存，未爲公允。”（《清詩三百首·朱彝尊傳》）又尚銘說：“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錄》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三家詩話》）復如近人姚大榮、黃賓虹等，對趙說也頗持異議。誠然，“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全集中精品所占比重也不大，這都是事實。但這是有原因的，當與竹垞晚年的地位、思想變化有關。竹垞刪去了早年乃至出仕前的若干作品，自有其苦衷。何況，刪餘的一千多首詩中，仍不乏佳作。因此，竹垞曾與漁洋并稱，在

當時文網嚴密的年代，不少詩人崇尚復古，紛紛以竹垞爲文宗，匯集在他的周圍，這絕非偶然。由於竹垞懲於明詩之病，舉起復古這面旗幟，加上他的同鄉李繩遠、李良年及其子朱昆田等的努力，方共同奠定了浙派中秀水詩派一支的始基，以至稍後的錢載、王又曾出而臻於全盛。顯然，他對於清詩的發展，終究還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清人之於竹垞詩，除趙秋谷外，各家評價並不一致。王士禛極稱道竹垞詩，譽爲“捨筏登岸”，“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林昌彝則認爲：“朱竹垞《風懷二百韻》，特游戲三昧耳，豈可以此貶賢？其不刪《風懷》詩也，曰‘吾不願爲兩廡特豚’，乃有慨於元明祀典之濫，故有激而言也。……吾謂國初諸老能兼經學詞章之長者，竹垞一人而已。”（《海天琴思錄》）胡薇元認爲《齋中讀書》十二首“爲竹垞全集之冠，亦爲清朝三百年之冠”，可“直紹昌黎”（《歲寒居詩話》）。又如梁章鉅轉引趙翼的話，稱竹垞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奧博，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類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梁又云：“錢籀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泠、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此論尤精。”（《退庵隨筆》）以上諸家評論，或不免揄揚過當，但亦足見竹垞詩自有其價值。至如指出其作品“多類唐自恣，不加修飾”，則亦合乎實際，不失爲平允之論。

三

詞，起於唐，盛於宋，經過元明兩代的衰頹，到清初又趨活躍。清代被稱爲詞的中興時期。朱彝尊，一向被目爲浙西詞派的領袖

和代表，是清代詞人中有影響、有地位的重要人物。

竹垞自己說過：“予少日不善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書東田詞卷後》）又說：“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水村琴趣序》）可見，他的詞多作於中年，早年、晚年都很少填詞。其收入《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烟閣體物集》、《蕃錦集》者，凡五百餘首。又曾纂輯唐、宋、元、明詞五百餘家爲《詞綜》。以上四種及《詞綜》一書，均成於竹垞四十至五十歲之間，亦即竹垞出仕之前，這很值得玩味。

竹垞詞論，除散見於他的文章、書信之外，集中反映在《詞綜·發凡》之中。《詞綜》乃竹垞從《花間集》等十餘部詞選、《百川學海》等十多種類書、野史，以及各家別集中採擷編選而成，前後歷時八年。經汪森增補兩次，一共成書三十六卷。《發凡》是這個選本的例言，共十七條，所談者不外作品來源、選詞標準、體例等等。竹垞的詞學見解，可於字裏行間尋繹得之。

《發凡》第三條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第十三條又說：“填詞之雅，無過石帚。”并斥責“《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爲“無目”。在《黑蝶齋詩餘序》裏也說：“詞莫善於姜夔。”在所填《解珮令·自題詞集》一詞中則自稱“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可見其對南宋詞格律派代表姜、張之推崇。《詞綜》選姜詞二十三首，占姜氏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其中包括“黍離之悲”的《揚州慢》和被人目爲“傷二帝之北狩”的《齊天樂·蟋蟀》等。竹垞之竭力倡導南宋，是有深意的。這首先與時代有關。吳衡照對此曾作了闡發，他指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人孟浪言詞者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又謂：“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准繩，起衰振聾，厥功良偉。”（《蓮子居詞話》）這說明竹垞的主張原